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剽取”钱穆《国史大纲》辨正

李孝迁

摘要 范文澜在延安编写《中国通史简编》，融会了众多前人研究成果，其中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和《国史大纲》从史料线索到历史观点为其提供支持，但并没有从《大纲》“剽取”材料之情形。《简编》与《大纲》叙事上的相近，一方面是由于共同的史源所致，另一方面《简编》确实从《大纲》获知史实来历，然后进一步扩展史料范围，取材于传统史籍，而非直接承袭钱著。延安史家之所以参考钱著，或因其多关涉底层疾苦、民生经济、统治者黑暗，颇有“进步”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契合《简编》的叙事取向。1940年代初，钱穆的政治立场逐渐暴露，中共史家对他的态度由正向转为批判，《大纲》则成为靶点之一，从而遮蔽了《简编》与《大纲》的学缘关系。

关键词 范文澜 中国通史简编 钱穆 国史大纲 剽取

作者李孝迁，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200241）。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5)11-0177-18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称《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下称《大纲》）是1940年代两部历史名著。^① 1959年5月24日，钱穆致余英时信称：“七八年前曾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书中极多剽取拙著《国史大纲》所引用之材料，当时颇感意外。”^② 于是后来余英时多次讲范著“以《国史大纲》为参证，却从所引文献中得到启示，发现其中很多材料也可以另作解释，以支持他的特殊观点，因此便毫不迟疑地移过来运用了”。^③ 余英时说钱穆与当时史学界主流不合，“和反主流派的学人却更为投缘，甚至‘左派’学人中也不乏和他谈得来的。例如杜守素便非常佩服他，范文澜也十分注意他的著作。40年代中，范文澜开始编《中国通史简编》，便颇取材于《国史大纲》，不过解释不同而已”^④。钱、余二氏均强调《简编》从《大纲》“剽取”材料，即指控前者所述史例多直接取于后者，而非摘引自原始文献。然而，钱、余皆无具体举证，海内外学界对此未予以关注，此案仍有待证明。

为了对此案能有全面的认识，除了细致比对《简编》和《大纲》之外，还需取证二者的“前身”，即范文澜《简编》初稿本和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下称《材料》），这两种文献对厘清范钱学缘关系不可或

① 《中国通史简编》共两册，分别于1941年9月、1942年12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国史大纲》于1940年6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② 钱穆：《素书楼余沈》，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348页。按：按时间推断，钱穆所见到的是旧本《中国通史简编》，而不是1953年后陆续出版的修订本。

③ 余英时：《〈国史大纲〉发微——从内在结构到外在影响》，《古今论衡》2016年第29期，第13页。

④ 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何俊编：《余英时学术思想文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321页。

缺。《简编》初稿本现藏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从原始社会写到鸦片战争前，约十万字，除绪言，凡三章三十五节，第一章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构成时代——远古到战国；第二章封建社会兴盛时代（秦—南北朝）；第三章封建社会变动时代（隋—清鸦片战争），历史分期与延安版相同。《简编》初稿本与延安版在史料和观点上虽有继承，但差异明显，如初稿本详古略今，重思想文化，对统治者多有赞扬，与延安版略古详今、详政治略文化、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叙事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延安版对初稿本作了深度改造，大幅扩充体量，观点上也有重大调整，更符合当时延安的政治文化。初稿本共三册，审查中批评意见颇多，最终没有出版。

《材料》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于 1934 年秋至 1935 年夏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印刷，随堂“发之听者，俾可自加研寻”。^① 该讲义包括两部分：一是中国通史纲要（上古—秦汉篇），共十五讲，从上古至东汉，“仅具轮廓，悉削游辞，取便总览”，但“自嫌太简，遂未继续”；二是中国通史参考材料（上古—北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② 1937 年抗战前，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通史一直以此讲义为参考书，在学界有所流通。^③ 《材料》是《大纲》的初胚，观点和史料后来多保留在后者，但也有舍弃。本文将以这四种文本作为基本史料，探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写作上是否存在“剽取”钱著材料的行为，进而说明中共史家对钱穆态度的前后转变。

一、《简编》与《材料》

首先，《简编》写作期间，延安文史工作者是否有可能接触到钱穆的通史著作？1941 年 11 月，金灿然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讲义里，更将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所要求的历史规定为：‘以后新历史之创造与历史知识之探求，自其性质言之，与以前之不同应有三点：一、民本的，非帝王的（全部的，非特殊的）；二、国家的，非朝代的（系统的，非间断的）；三、文化的，非势力的（演化的，非争夺的）。应整个的指示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经过，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历史学的研究上也正如同在其他事业上一样，并没有忠实于他们的最高理想。在把他们所标榜的历史原则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时，便不免投入了封建学者的圈套，以精神、心、道等等唯心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过分的估计了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民本’的意义。”^④ 金氏所引钱穆的文字，并非出自《大纲》，而是《材料》第一讲“通史之意义”。^⑤ 《材料》之所以出现在延安，或与金灿然、辛安亭、范文澜有关。《材料》虽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当年上过钱穆中国通史课程的学生应有该讲义，在北平学术界有所流传。金灿然于 1936 年入北大史学系学习，1937 年休学。辛安亭于 1931 年夏考入北大史学系，至 1935 年休学。^⑥ 金、辛二人或听过钱穆 1933 年秋始讲的中国通史^⑦，1938 年他们去延安时或带着《材料》；另外，1930 年代范文澜在北平各大学教书，1932 年、1933 年在北大国文系开设“古历学”^⑧，并对史学系开放。范文澜出身北大，一度与钱穆同校执教，《材料》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藏书。金灿然也是中国历史研究会的成员，参与《简编》编写，他在延安能引用《材料》，范文澜作为他的领导，自然也有机会接触到钱著。

①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年，第 158 页。

②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 年，“书成自记”。

③ 当年杨联陞在北平东安市场旧书店购得装订成册的钱穆中国通史讲义，后来赴美国留学时随身携带了它，并于 1973 年送给余英时，后者将此稿交给台湾黄俊杰去接洽出版事宜，最后由澳门东昇出版事业公司 1982 年重印。（余英时：《出版前言》）

④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288 页。

⑤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 4 页。

⑥ 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筹备委员会编：《国立北京大学历届同学录》，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出版部，1948 年，第 116、140 页；国立北京大学编：《国立北京大学一览》（1933 年度），第 502 页；《国立北京大学学生一览》（1935 年度），第 122 页。

⑦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76 页。

⑧ 王应宪编校：《现代大学史学系概览》（上），第 69、78 页；范文澜：《从烦恼到快乐》，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年，第 135 页。

其次,《简编》是否参考过《材料》?总体上,《简编》初稿本与《材料》相似处不多,但有存在关联的迹象。如《简编》初稿本有一段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论述:

从传说中的太古时代起,不同的种族相互混合,没有停止过。春秋时代,黄河流域还有少数的夷戎狄等族杂居着。战国时代中国疆域扩大到长江下游,各族化成一个大民族。经过秦始皇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这个民族更趋巩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四个民族特征大体具备了。秦汉间儒家写一篇文章叫做《中庸》,说当时的国家统一是“今天下,车同轨(共同地域经济),书同文(共同语言文字),行同伦(共同心理)”。这种说明也颇合于民族的科学原则。^①

范文澜根据斯大林的标准^②,引用《中庸》的话,提出秦汉时已开始形成汉民族。此说或因与斯大林主张民族是“上升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③相冲突,故被延安版删去。在1948年订正本,范文澜改“种族”为“民族”,补充论述秦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因为“秦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民族的国家,消灭了华族内部的互相对立,团结华族一致对外”。^④华族即汉族,周代称华族,汉以后称汉族。^⑤订正本特意在延安版第二编的题目“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前添加“民族统一的”,第二编第一章写秦朝,原名“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底成立”,订正本改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底成立”,并在正文补充秦朝“开始建立中国民族统一的国家”。^⑥这些只言片语的改动,表明范文澜最初主张汉民族开始形成于秦,但迫于与斯大林观点相左,延安版暂时压制此说,但1948年又恢复旧说。1950年代范文澜重提汉民族形成问题,遂引发“五朵金花”之一的大讨论。^⑦

有趣的是,钱穆《材料》也提出秦朝统一带来“中国民族之抟成”,谓“春秋时代华夷杂处之局,逐渐消融,而成一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之社会”。^⑧此处“中国民族”是指汉民族。1940年《大纲》保留这些文字,更明确提出秦朝统一的重要性之一在于“国家民族之抟成”。^⑨范、钱均主张汉民族形成于秦,关键证词都引《中庸》这句话,两者观点和证据近乎一致,考虑到前者参考过《材料》(见下文),范文澜此说可能渊源于《材料》和《大纲》。^⑩

《简编》至少有两处叙事,与《材料》存在显著关联。其一,上古禅让。《材料》关于禅让有如下论述:

唐虞传位,此事殆系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成为理想之禅让。旁观史乘所载,如乌桓、鲜卑、契丹、蒙古,其君主皆由推选渐变而成世袭。唐虞时代之文化,正可由此看法。^⑪

钱穆编《材料》期间撰写《唐虞禅让说释疑》一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史学社出版的《史学》第1期(1935年1月),收录于讲义。此文对上引观点作了论证,钱穆指出:

考之史乘,东胡如乌桓《三国志·魏志》卷30引《魏书》、鲜卑《三国志·魏志》卷三十引《魏书》、北狄,如契丹《旧五代史·外国传》、蒙古,其先王位乌桓、鲜卑皆称大人,皆由众部落豪帅推选。中国上世疑亦有此。

并引《尧典》中尧“咨四岳”的史例,说明:

当时王位承继人,乃经众贵之推选,得时王同意,再登朝试绩,既可经前王之指导,又得为实政之练习,意良美,法良密,较之乌桓、鲜卑、契丹、蒙古诸族,似稍智矣。此特据《尧典》推说,自不得谓全属当时实况。然当时实况自亦可由此推测也。

加注释说: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初稿本,第11节“民族国家的成立——秦”。

② “民族是历史上结合而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领土、有共同经济联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的共同心理状态的固定集团。”(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张仲实译,出版地不详,生活书店,1939年,第10页)

③ 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张仲实译,第443页。

④⑥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上),华北:新华书店,1948年,第138、172页。

⑤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延安:新华书店,1941年,第8页。

⑦ 详参张越:《范文澜与“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7期。

⑧⑪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78、11页。

⑨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79页。

⑩ “我以为《中庸》里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这十二个字,是最表现得出我们民族形成的情形的,而亦即是我们民族所以能形成的原因。”(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年,第48页)吕氏与钱穆有师生关系,吕著序完成于1934年12月,正式出版于1935年3月,此时他不可能见到钱穆《材料》讲义,而钱穆此前或已受吕氏的影响。

此后文王时所谓虞芮质厥成，即《三国志·魏志·乌桓传》引《魏书》所谓推雄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也。^①

钱穆认为《尧典》传说有事实之基础：“余读《尧典》，其文虽成于后人，其传说之骨子，则似不得谓全出后人捏造。……古今人不相远，岂应古人学人专好造谣乎？古人言尧舜陶渔及舜浚井治廩诸故事，殆亦如乌桓大人各自畜牧营产不相徭役之意。《后汉书·乌桓传》。许行亦言神农与民并耕而食，其传说来源非全无因，而后人各以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②

《简编》初稿本说：“在黄炎夷三族联盟的社会里，行施着土地公用的‘共财’制度，行施着选举盟长（当选人限于黄族酋长）的‘禅让’（也称为‘传贤’）制度。”^③ 范文澜还没有从“取其他落后种族的记载，作远古历史的参考”^④ 角度解释上古禅让现象。到了延安版，范文澜对“禅让”的认识，采取了钱穆的思路。范文澜对《尧典》史料价值的看法与钱氏相同：“《书经》有《尧典》等篇，叙述尧舜禹禅让的故事。……关于他们的传说，似乎比黄帝以下诸帝，较富于真实性。……虽然不一定有意捏造，夸大虚饰却所难免。”^⑤ 他接受钱穆的解释：

所谓“禅让”制度，实际就是氏族社会的会议选举制度。这种制度在后世落后种族中如乌桓、鲜卑、契丹、女真、蒙古都曾行施，有记载可以考见。

钱氏注意到《尧典》中记载，“尧命其臣推选王位候补人，而尧臣首以尧子丹朱对，则其时王位继承已渐有传子之端倪矣”。^⑥ 《简编》引《尧典》，对于皋陶死举皋陶子益的现象，同样认为“似乎已有父死子继的意义”。^⑦ 《简编》引征《魏书·乌桓传》，叙述乌桓习俗：

他们选举勇健能战、公平解决争讼的人做大人。邑落各有小帅，数百千落自为一部。大人有召呼，各部落不敢违犯。大人和小帅，都是选举，没有世袭。大人以下，各有畜牧治产，不相徭役。敬鬼神，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先世大人有勇名功业的也用牛羊祭他们。没有法律，止相约：违大人命令，死；盗掠不止，死。部落间有仇怨，得自相报复，报复不止，请大人评判，理曲的部落，出牛羊赎罪。自杀父兄无罪，但不敢杀母，因母有母家部落，要出来报仇，杀自己的父兄，没有人替他们报仇。^⑧

这些史料不全见于《材料》，而是受钱著指示，《简编》直接取材于《乌桓传》。由此史料的启发，范文澜提出：

中国古帝，少皞、颛顼、帝喾，名号流传，大概也像乌桓祭先世勇健有功业的大人一样。^⑨

《大纲》没有保留《乌桓传》关于“大人”的史料，所以《简编》此处参考的是《材料》。

其二，“人民浩劫”。《材料》有“民间之劫运”一节，计划写（一）董卓在洛阳，（二）李傕、郭汜在长安，（三）曹操在徐州，（四）袁术在南阳，（五）刘虞卒后之幽州，（六）刘表卒后之荆州，摘录了《后汉书·董卓传》《汉书》《三国志·司马朗传》《三国志·董卓传》《后汉书·陶谦传》《魏志·武帝纪》《后汉书·袁术传》《后汉书·刘虞传》《后汉书·公孙瓒传》《后汉书·刘表传》《通鉴纪事本末》中的相关史料。^⑩ 《简编》初稿本第十七节“军阀混战到三国鼎立”，叙述军阀混战导致人民死亡数量惊人^⑪，或已受《材料》影响。延安版将节名从“军阀混战”改为“人民浩劫”，简述“军阀们的暴行”，受《材料》“民间之劫运”一节影响益明显。延安版也分别写董卓、李傕、袁绍、袁术、公孙瓒、陶谦、曹仁诸人的暴行，主要依据《材料》提供的史料线索。如《简编》叙述董卓残暴的史例：

某次派兵到阳城（河南登封县），正是春季乡村大庙会，卓兵突然包围，男子头全数割下，挂车辕车轴上，载妇女财物回洛阳，声称攻贼大胜。^⑫

此事记载于《三国志·董卓传》：

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

^{①②⑥⑩}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参考材料，第 17—18、19—20、18、311—315 页。

^③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初稿本，第 1 节“我们的祖先原始共产主义者”。

^{④⑤⑧⑨⑫}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 9、10—11、9—10、10、120 页。

^⑦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 11 页。按：钱穆没有提及“女真”，此处是范文澜添补的。

^⑪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初稿本，第 17 节。

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①

《材料》摘录了《后汉书·董卓传》和《三国志·董卓传》。关于上引史例，《材料》采用《后汉书·董卓传》^②，而《简编》取于《三国志·董卓传》，两者文字略有出入。《简编》专用一定篇幅逐个写东汉末年军阀们的暴行，无疑受《材料》的暗示。《材料》“民间之劫运”一节反被《大纲》删除。

钱穆在《材料》提出：“旧传的历史，只可认为一种积存的历史材料，而并非即是今日所需要之历史知识。……中国通史之编写，应扼要而简单，应有一贯的统系而能映照现代中国种种复杂难解之问题。应从积累的历史材料里寻求，应力求其客观公允。应从极艰苦的准备里，做出极平易的成绩来。”^③ 延安史家总体上虽不认可钱氏通史，但对这一主张应该心有戚戚焉。范文澜一方面认为《二十五史》《资治通鉴》一类现成的史书不适于学习历史的需要，另一方面强调新通史应从“广泛纷乱的大堆史料中去寻找”中国历史比较近真的情况，叙事“简明扼要”^④，其看法与钱氏相通。

二、《简编》与《大纲》

范文澜编写《简编》延安版之时，不仅受《材料》影响，也参考了钱穆《大纲》。《简编》初稿本完成时间应在1940年8月前，由于审查没有通过，才重启编写延安版的计划。延安版写作时间是1940年8月至1941年4、5月完成上册（五代十国以前），至年底完成中册^⑤，上中册分别初版于1941年9月、1942年12月。《大纲》于1940年6月、7月先后在上海、长沙出版，正值范文澜编写《简编》初稿本前后，时隔太短，后者能见到《大纲》概率极低，从文本内部来看，也不见二者存在关联。延安方面或在1940年8月至1941年4月间得到《大纲》，离《大纲》出版时间最长已约八九个月，范文澜编写延安版期间有机会见到《大纲》。^⑥ 从文本内部呈现的证据来看，延安版确实参考过《大纲》，兹举二例。

其一，战国养士。《简编》初稿本从正面写战国士人群体，认为士的活动创造了“文化的黄金时代”。^⑦ 这是非常积极的评价，说明此时范文澜还没有接受《材料》对士的批判视角，但延安版的态度发生反转，采取了钱穆的叙事取向。《材料》有一节“贵族养贤”：

因孔墨的兴起而有国君养贤之制，因游仕之逐步得势，而国君养贤渐转而为公子养贤。国君养贤如魏文侯、鲁缪公，而大盛于齐之稷下。齐宣王时有王斗、颜斶，秦昭王跪见张禄先生，燕昭王师郭隗，筑黄金台，全是君下士极好的榜样。公子养士，则以孟尝、平原、信陵、春申四人为著。孟尝君田文，尤开风气之先。他父亲靖郭君，为齐威宣湣三朝相，孟尝又相秦昭王、魏哀王。称薛侯，中立于诸侯。他的声势地位如此，然而他却极端的下士。门下食客有三千人，薛中招致有六万家。无贵贱一与之等。其故事详载《国策》《史记》。然而孟尝门下，大都只是些鸡鸣狗盗之徒。其他三君也全如此。游仕气焰之高涨，实为那时一特著的现象。然而真士少，得士之效用者不多。^⑧

这些文字大多保留在《大纲》。^⑨ 延安版列“养士制度”一节，应与《材料》所谓“养贤之制”有关，然《大纲》却不再提这种说法。范文澜或根据钱穆的提示，从《战国策》《史记》寻找更多故事彰显士的丑恶和

① 陈寿撰，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魏志》卷6《董卓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② “尝遣军至阳城，时人会于社下，悉令就斩之，驾其车重，载其妇女，以头系车辕，欢呼而还。”（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参考材料，第311页）

③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2、4页。

④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序。

⑤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6期。

⑥ 钱穆说“《史纲》出版后，仅最先一批书数百本得海运送河内，运销后方”（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08页），当时重庆是陪都，应该能较快见到《大纲》。不少中共人士往返于重庆、延安两地，有可能为延安史家携带《大纲》。据当时在延安的荣孟源回忆：“延安的书籍是依靠从蒋管区来的同志们随身带来的，是依靠负责同志到蒋管区工作时购买来的。”（荣孟源：《回忆范文澜同志》，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2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7页）目前虽无法确知延安方面何时、通过何种渠道得到《大纲》，但1941年前后，延安史家已能读到《大纲》是肯定的。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初稿本，第7节。

⑧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72—73页。

⑨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73—74页。

无能，其中与《材料》《大纲》相近的叙事如下：

国君养士著名的有魏文侯、齐宣王、燕昭王。贵族著名的，齐有孟尝君田文，赵有平原君赵胜，魏有信陵君魏无忌，楚有春申君黄歇……田文的父亲田婴，有黄金一万斤，又封为薛公。田文继承大财产，在薛召集豪侠奸人六万多家，宾客三千多人。其中有犯罪亡命的，有装狗偷窃的，有学鸡叫的，不论贵贱，一律招待。^①《大纲》增补的叙事均出自《战国策》《史记》，如“春申门下最暗淡，惟珠履三千而已”^②，延安版则谓“黄歇也有食客三千余人，上等客都着珠履，其实全是不中用的废物”^③，两人均否定游士的贡献。

关于战国名士鲁仲连，《简编》初稿本、《材料》都没提及，而延安版和《大纲》竟同举此人，且持相同观点。《大纲》添加关于鲁仲连的评论：

伪滥杂进，则真士不至。即如鲁仲连，如天外游龙，岂四君子所能致耶。然仲连以一游士，立谈之顷，能挽回秦赵交争国际向背之大计，此等气魄意境，后代社会殊不易见。亦正因在士气高张之时代下，故得成此伟迹耳。^④

延安版与《大纲》一样，也举鲁仲连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真士代表，钦佩此人高洁的品格：

当然，士也有比较有人格的。司马迁作《史记》，特别给鲁仲连立传，鲁仲连确是战国唯一的高士。他不肯做官任职，他反对秦国奴隶般待遇人民。邯郸被秦围困，他跑进危城，反对降秦。邯郸解围，平原君封他土地，坚辞不受。送他黄金千斤，鲁仲连笑道，士应该替人家排患难，解纷乱，如果受报酬，与商贾无异，我不忍这样做。告辞去赵，终身不见平原君。后来在齐国立功，齐王要封他，鲁仲连逃走，隐居海边不见人。他说，为了富贵屈服于人，不如贫贱行动自由。^⑤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表明范文澜极可能在写作时参考了《大纲》的相关论述。

需要说明的是，《材料》和《大纲》涉及东汉以前许多观点和史料相同，延安版与钱著相近的叙事，到底参考何处，大多数情况下难以辨别。如《大纲》谓：“在殷墟后冈之发掘，发见上层有白陶即小屯文化，中层有黑陶即龙山文化，而下层有彩陶即仰韶文化，则其地似在白陶文化人居住前，已有黑陶文化人居住，更先有彩陶文化人居住也。”^⑥这句话的史源见于 1933 年梁思永的论述^⑦，也出现在《材料》。^⑧范文澜借钱著提出“后冈（河南安阳县）发掘最下层是红陶，中层黑陶，上层白陶，递变的形迹显然”，“可以想见远古种族间、文化间的斗争状况”。^⑨范文澜依据《材料》抑或《大纲》，便无从认定。又如《简编》说：“士族掌握着统治权，朝代改换，士族地位不变，所以南朝士人重家不重国，重孝（伪装的孝）不重忠，种族耻辱更不在意想中。”^⑩这一观点或据钱著。《大纲》谓：“他们似乎只注重个人家庭和朋友，而忽略了社会和国家。孝与廉为东汉士人道德之大节目，然此二者全属个人和家庭的，非国家和社会的。……因东汉人只看重私人和家庭的道德，故王室倾覆后，再不能重建一统的中央，而走入魏晋以下之衰运。”又指出过分重道德其弊“导人于虚伪”。^⑪这些论述都已出现在《材料》^⑫，《简编》接受何者同样无法判断。

其二，《简编》某些独特表述或观点，似与《大纲》有关。如王莽变法，《大纲》说：

王莽居摄及受禅后之政治，举其尤要者，如王田尽收天下田亩为国有，而均之耕者，废奴解放奴隶，用意在解决当时社会兼并此乃自先秦以来早待解决之一重要问题也，消弭贫富不均，为汉儒自贾、董以来之共同理想。^⑬

《大纲》不少叙事沿袭《材料》，但也有独属的文字，如“此乃自先秦以来早待解决之一重要问题也”，为

^{①③⑤⑨⑩}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 64、64、65、4、159—160 页。

^{②④⑥⑪⑬}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 74、74、3、135、105 页。

^⑦ “上层所包含的是白陶文化（即小屯文化）的遗物；中层所包含的是黑陶文化（即龙山文化）的遗物，下层所包含的是彩陶文化（即仰韶文化）的遗物。每层所包含的遗物里，不但有他所代表的文化的普通器物，并且有那文化的特殊制品。如果把地层上下的次序依考古学的基本原则‘翻译’成时间的先后，我们就可以知道后冈上在白陶文化的人居住之前，黑陶文化的人曾在那里住过，在黑陶文化的人以前，又有彩陶文化的人在那里住过。”（梁思永：《后冈发掘小记》，《安阳发掘报告》1933 年第 4 期，第 615 页）

^⑧ “在殷墟后冈之发掘发见上层有白陶（即小屯文化），中层有黑陶（即龙山文化），而下层有彩陶（即仰韶文化），则其地似在白陶文化人居住前，已有黑陶文化人居住，更别又有彩陶文化人居住也。”（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 19 页）

^⑫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 114—115 页。

《材料》所无。《简编》初稿本认为王莽变法政策“有很大进步性”，称赞“王莽是大胆改革的革命家”^①，与后来延安版出入甚大。延安版对王莽变法的叙述与《材料》《大纲》相近，如认为西汉社会问题：一是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二是贫民被迫沦落当奴隶^②，即是《材料》《大纲》所提出的王田和奴婢问题。延安版说：“问题必须解决，王莽就是企图解决问题的一人……企图解决问题的王莽，成为被问题解决的王莽……王莽做了十五年皇帝，不能解决当时的根本问题，反而促成了农民起义。”^③ 范文澜之所以有此论述，或与仅出现在《大纲》“此乃自先秦以来早待解决之一重要问题”有关。延安版谓王莽“行为怪诞”^④，或缘起于《大纲》“莽之得国，多本齐学，有太涉荒诞者。莽之新政，多本鲁学，有太过迂阔者”之论述。^⑤ 钱穆提出“问题”“荒诞”“迂阔”诸词，不见于《材料》，仅见于《大纲》，所以延安版此处应受《大纲》的影响。

《简编》与《大纲》就理论系统来说无疑是异质的，但具体到某些历史观点，两者相通之处却不少。如关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他们都趋向于传统一线相承的观念。钱穆《材料》说：“至于夏商周三代，其最先来源如何，是否同族同血统，则今尚难说也。”^⑥ 范文澜则回避这一问题，《简编》初稿本审查意见中就提出“夏殷是并存呢还是先后呢？”“汤桀是上下级的关系呢？还是两族斗争？”^⑦ 延安版对此仍没有回答。范文澜无视当时学界对于仰韶文化与殷墟是否同属一个系统文化尚有分歧，径直断言：“小屯发掘，得到大量殷代遗物，考古学家证明与仰韶是同一系统的文化”^⑧，然事实上绝大部分中外考古学家并没有完成“证明”。^⑨ 他还假设仰韶文化就是黄帝族的文化，推论“黄帝与殷商间，实有不可割断的脉络存在着”。^⑩ 然后他又进一步谓“商周文化又证明是同一系统，所以殷文化是周文化的先驱”^⑪，那么黄帝以来的三代就同属一个系统的文化。所谓“商周文化又证明是同一系统”，《简编》只有结论，没有具体举证，《材料》《大纲》倒略有论证。《材料》得出“据此并不见殷周乃两种文化突殊相异之民族”^⑫，《大纲》进一步确认“若以殷代文化与周初相较，则颇见其有一脉相承之迹”。^⑬ 既然殷周同属一个系统的文化，那么殷文化自然是周文化的“先驱”。

若撇开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的那些术语名词，范文澜与钱穆的古史观非常接近，他们一开始都隐晦接受中国文化西来说。《材料》谓“仰韶文化则代表与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触过的西北文化”^⑭，《简编》说“黄帝从西方来，又是历代相传的旧说。考古家证明中国仰韶系彩陶，与巴比伦的素沙、中亚细亚及屈里波夷等地出土的彩陶同一系统”^⑮，但1950年代以后他们在修订通史中都彻底放弃了西来说，转而坚信本土说。^⑯ 钱、范的古史观虽以考古论述呈现，面子看似“科学”，实则里子仍是传统观念，诚如邓嗣禹评《简编》是“新瓶装旧酒”（put the old wine in a new jar）。^⑰

①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初稿本，第14节。按：192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王莽的评价，反转传统观点，颇多学者肯定其作为，如胡适誉之“社会主义者”、吕思勉称之为“社会革命家”。（胡适：《王莽：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社会主义者》，《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1年，第31页；吕思勉：《白话本国史·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51页）

②③④⑧⑩⑪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105、106—108、107、24、8、24页。

⑤⑬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106、19页。

⑥⑫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24、27页。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初稿本，第4节。

⑨ 李济《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0年第2期）、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1931年第3期），主张仰韶与小屯为两种不同的各自发展的文化。

⑭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19页。按：《大纲》中这句话添加“或”，即“仰韶文化则代表与更古的西方文化接触过的西北文化”，“因仰韶文化均有一种带彩的陶器，上绘几何花纹，颇与中亚南欧一带石器时代遗址中所出有类似处也”。（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3页）说明他对旧说已有所动摇。

⑮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5页。按：范文澜此处接受郭沫若《释支干》一文论述：“汉人种自古有西来之说，近年瑞典安特生博士（J. G. Andersson）于河南仰韶、甘肃新店等地，发现上古时代之彩陶，与发现于巴比伦之素沙（Susa）与中央亚细亚之安脑（Anau）、屈里波夷（Tripolji）者同一系统。”（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下册，上海：大东书局，1931年，第87页）

⑯ 1953年范文澜《简编》修订本第一编删除了旧本《简编》“黄帝从西方来”云云；1974年钱穆《大纲》修订本谓：“民国十年发现仰韶彩陶上绘几何花纹，西方学者仍认其与中亚、南欧一带有关系，但今亦无人置信……中国民族中国文化西来之说，可以不攻而自破。”（《大纲》修订本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页）而他自己最初也相信此说。

⑰ S. Y. Te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8, No. 2, 1949, p. 147.

再如，关于春秋时期华夷关系，《简编》与《大纲》论述一致。延安版指出：“戎狄蛮夷侵略中国，并且有的和华族杂居在内地。华夷斗争的结果，山东夷族被灭于齐，陕西戎族被灭于秦，山西、河北两省的狄族，被灭于晋。止有南方的蛮族，建立楚吴越三个大国，与中国不断战争，想夺取霸权。华族有齐晋二个霸国，纠合诸华，协力御侮，终于把蛮族同化了。”^① 但此时范文澜没有继续发挥《简编》初稿本“统一的民族是要求统一的国家的”观点^②，反而暂时放弃汉民族形成于秦汉时期的主张，1948 年订正延安版时才重拾旧说，并进一步补充解释：

周朝以来，虽说华族占据中原，蛮夷戎狄各族在华族的四周；但在实际上中原地区也是各族杂居。华族生产进步，文化较高，因此逐渐的把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各民族和四周边沿地区的一些民族同化了。……各民族被华族融化，扩大了华族的疆域，也消失了华夷界限。战国时，中原地区已经没有华夷斗争的民族问题，但是北方游牧民族，却不断向南侵袭。落后的游牧民族进攻农业民族，在军事上总是容易获胜，因此，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不受落后民族的破坏，是华族面前的大问题……秦统一全国，建立起中国民族的国家，消灭了华族内部的互相对立，团结华族一致对外，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是当时人民的要求。^③

范氏关于华夷“杂居”的论述，或受钱穆的启发，本于《大纲》“旧说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各远居四裔，而诸夏在中原，此观念殊不可恃。当时盖为一种华夷杂处的局面，而此局面自始即然，亦并非自周王室东迁，四裔异族乃始交侵而入中国”。^④ 钱穆观点或来自夏曾佑《中国古代史》所谓“与中国杂处之戎狄”。^⑤ 他曾细读夏书，承认从中“得益亦甚大”。^⑥ 此外，钱穆认为：

文化先进诸国逐次结合，而为文化后进诸国逐次征服。同时文化后进诸国，虽逐次征服先进诸国，而亦逐次为先进诸国所同化。其文化落伍诸部族，则逐次消灭，或逐次驱斥。在此进展中，诸夏结合之团体亦逐次扩大，为中国逐次形成大一统帝国之酝酿，而上古史亦逐次宣告结束。^⑦

范文澜则认为落后的游牧民族虽在军事上战胜农业民族，但最后都被“华族融化”，二者其意相通，后者或汲取前者的暗示。^⑧

三、“剽取”说辨诬

《简编》确实参考过《材料》《大纲》，根据钱著的指引，从史料到观点都有所采纳，但仅就某些相似的叙事，便草率认定《简编》“剽取”《大纲》所用材料，这不符合实情。《简编》与《大纲》之所以出现某些叙事相近或相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情形：

其一，两者取材于共同的史源所致。兹举南朝刘宋的宫闱之乱为例，《简编》和《大纲》都举证了许多相同的史例，说明南朝政治的黑暗，若不细查，易形成《简编》“极多剽取”《大纲》的判断。在没有接触《大纲》之前，范文澜编写《简编》初稿本时，已形成南朝政治黑暗的认识，他说：“南朝末年，士族生活腐化到香料熏衣，剃面、搽粉、涂胭脂，走路要人扶持……由于南朝士族的极端腐化，统治阶级的互相残杀，政治远落后在隋朝后面。”^⑨ 所谓“剃面、搽粉”之说，出自《颜氏家训》“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⑩ 稍

①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 55 页。

②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初稿本，第 11 节“民族国家的成立——秦”。

③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上），第 137—138 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 34—35 页；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 43 页。按：《大纲》《材料》论述几乎相同。

⑤ 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年，第 194 页。

⑥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75 页。

⑦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 42 页；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纲要，第 49—50 页。按：《大纲》《材料》论述几乎相同。

⑧ 此说在史学界非常流行，并非独特，早在晚清从日本引入的那珂通世《支那通史》即有类似观点：“胡人或能以其武胜汉，而以其文则必自服于汉。”（那珂通世著，周保明点校：《支那通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年，第 7 页）考虑到范文澜参考过钱穆《材料》《大纲》，所以《简编》此处论述受钱著启发可能性颇大。

⑨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初稿本，第 19 节“汉族中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南朝”。

⑩ 王利器撰：《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卷 3《勉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6 年，第 148 页。

后,《简编》与《大纲》皆引《颜氏家训》同一处流行的史料^①,未必与《大纲》有关,因为《颜氏家训》是常见书,不独钱穆能想到,此前通史也多有采用。^②《简编》初稿本没有具体写南朝如何腐化、如何残杀,但延安版“南朝五朝的兴亡”一节,尤其写到刘宋,范文澜借用《资治通鉴》、赵翼《廿二史札记》(下称《札记》)的材料,从秽行、暴行、贪侈、屠杀亲属四方面描述刘宋帝王的残暴。除了“贪侈”,其余三项多据《札记》“宋齐多荒主”“宋世闺门无礼”“宋子孙屠戮之惨”三条。

《材料》关于南朝计划写“南朝氏族之地位”“氏族之流弊及其衰落”“南北氏族之异同”,最初没有具体观点,只摘录一些材料,主要是赵翼著作,如《陔余丛考》卷十七《六朝重氏族》、卷十七《六朝忠臣无殉节者》,《札记》卷八《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卷十二《江左世族无功臣》,但没有论及南朝政治之阴暗。《大纲》则有“南朝王室之恶化”一节,取材于赵翼著作,举证说明“宋齐两代诸帝之荒荡不经,其事,几乎令人难信”。^③《简编》对此与钱著高度重叠,但并非取之《大纲》,而是本之《札记》。《简编》写刘宋的“暴行”:

子业做太子时,常被骏斥责。骏死,子业做皇帝,要发掘骏墓报仇。太史说掘墓对子业不吉,才免发掘。

取粪便浇墓上,大骂酒糟鼻子奴(骏嗜酒鼻红)。^④

此处转述自《札记》“宋齐多荒主”条:

前废帝子业,孝武帝之长子也。幼而狷急,在东宫,每为孝武所责……自以在东宫时不为孝武所爱,将掘其景宁陵,太史言不利于帝而止,乃纵粪于陵,骂孝武为魑奴。^⑤

《大纲》虽也摘录《札记》,但无“骂孝武为魑奴”,可证《简编》是直接用《札记》而非《大纲》。此外,《简编》取材不限于《札记》,延安版说:“或性猜忌忍虐,信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必需避忌祸败凶丧等字以及类似不吉的辞句,如‘驁’字像祸,改‘驁’为‘瓠’,诸如此类,臣下误犯必加罪戮。”^⑥此为《大纲》《札记》所无,见于《资治通鉴》:“及晚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驁’字为‘瓠’,以其似‘祸’字故也。”^⑦范文澜早年对史学颇用力,著有《正史考略》(文化学社,1931年),对历代正史、《资治通鉴》以及论史专书如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赵翼《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颇为熟悉。范、钱同取赵著中的材料,故叙事相近,但不能因此即以为《简编》取自《大纲》。

其二,两者叙事虽相似,但各有所本。这类情形不少,兹举三例,以概其余。《简编》叙述南朝士族制度,为了说明士族与非士族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举纪僧真的故事:

萧赜(齐武帝)时,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宠,僧真自觉有士族风度,请求萧赜说,臣出身武吏,荣任高官,请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萧赜说:这要江敷认可,我不能作主,你可往见江敷。僧真奉旨往见,竟登客位坐下。江敷命左右,移开我的坐床,不要近他。僧真丧气退走,告萧赜道,士大夫真不是天子权力所及。^⑧

此事最初见于《南史》:

中书舍人纪僧真幸于武帝,稍历军校,容表有士风。谓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敷、谢瀹,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敷,登榻坐定,敷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⑨

钱穆《大纲》对此也有叙述:

①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160页;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195页。

② 黄现璠、刘镛合著:《中国通史纲要》上册,文化学社,1932年,第204页;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60页;周谷城:《中国通史》上册,上海:开明书店,1939年,第472页。

③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191页。

④⑥⑧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165、165、159页。

⑤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1页。

⑦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133《宋纪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156页。

⑨ 李延寿撰:《南史》卷36《江夷传》附《江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纪僧真幸于宋孝武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愿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數、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纪承旨诣數，登榻坐定，數命左右，移吾床让客。纪丧气而还，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①

纪僧真故事出现在许多史书中，《简编》与《大纲》虽同举此例，但叙事略有不同，可证各有所本。

《资治通鉴》据《南史》对纪僧真叙事如下：

中书舍人纪僧真得幸于上，容表有士风，请于上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邀逢圣时，阶荣至此；为儿昏得荀昭光女，即时无复所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數、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

僧真承旨诣數，登榻坐定，數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②

从《简编》“请求萧赜说”“不要近他”等措辞，可推断范文澜从《通鉴》选取纪僧真的叙事，译成白话，而不是本之《南史》；而《大纲》所述既不是取于《南史》，也不是《资治通鉴》，而是转引自赵翼《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条：

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簿，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數、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數，登榻坐定，數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见《南史·恩幸·纪僧真传》。^③

赵翼注明这段叙事见《南史·纪僧真传》，其实除了第一句，其余见于《南史·江數传》，而且误齐武帝为宋孝武帝。钱穆《材料》摘录了《陔余丛考》“六朝重氏族”条。^④《大纲》不仅因袭了赵翼的错误，如“宋孝武帝”，更将“告帝曰”脱“告”字，导致言说者原本为纪僧真，却被他替换成“帝”。^⑤

《简编》和《大纲》均道及高力士，前者谓：“太子呼他为兄，诸王公呼他为翁，驸马辈呼他为爷。”^⑥后者说：“时诸王公主群呼高力士为翁，戚里诸家尊曰奢，肃宗在东宫，亦呼之二兄。”^⑦两者叙事看似相同，实则文字细微的差别，反映其史源的不同。《简编》取于《资治通鉴》：“太子亦呼之为兄，诸王公呼之为翁，驸马辈直谓之爷。”^⑧《大纲》则取之《札记》：“肃宗在东宫，亦以兄事之。诸王公主呼为翁，戚里诸家尊曰奢”，而“二兄”之说综合了《旧唐书》的史料。

关于元代羊羔儿息，《简编》叙述如下：

蒙古人起初不知经商，银钱交斡脱人（犹太人 Jude）、回回人经营高利贷业。一年本利相等，次年本利总数又加一倍，本银一锭，十年后得本息一千二十四锭，称为羊羔儿息。官民因借债破产出卖妻子，仍不能偿还。至元八年，忽必烈设立斡脱所，官营高利贷，称为斡脱官钱，名义上规定三分取息。皇帝为首，所有诸王、后妃、公主、贵臣、寺观、军官、犹太、回回、地主豪强，无不经营斡脱业，债户到期不偿本利，妻女牲畜多被拖走。扎木真妃子曾遣人索还斡脱钱，不说原借钱数，止说不鲁罕丁等三人借钱，恃势穷追，竟牵累一百四十余户。^⑨

《大纲》也有类似记载：

①⑦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 216、341 页。

②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 136《武帝上之下》，第 4291 页。

③ 赵翼撰，栾保群点校：《陔余丛考》（中），北京：中华书局，2019 年，第 406—407 页。按：赵翼虽注明出自《南史》，但所述文字与原文略有不同，如“本州”原为“本县”、“固”原为“故”，借此可确定钱著所述依据赵著。

④ 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参考材料，第 346—350 页。

⑤ 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没有订正这两处错误。

⑥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 257 页。

⑧ 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 216《玄宗下之上》，第 6889 页。按：《资治通鉴》此处本之《旧唐书》卷 184《宦官传》“肃宗在春宫呼为二兄，诸王公主皆呼阿翁，驸马辈呼为爷”。

⑨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 424 页。按：赵著此处本之《新唐书》卷 207《宦者传上》“肃宗在东宫，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为翁，戚里诸家尊曰奢”。

⑩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册，第 221 页。

《黑鞑事略》：鞑人只是撒花（找外快钱），无一人理会得贾贩。只是以银与回回，令其自去贾贩以纳息。回回或自转贷与人，或自多方贾贩，或声称被劫而责偿于州县民户。又曰：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谓之羊羔儿息。民间普通以缗取三分为常。见《牧庵集》十三。^①

两者叙事颇有重叠，但《简编》却不是取自《大纲》，也不是《黑鞑事略》，而是摘录于吴晗《元代之社会》一文，如“蒙古人不知商贩，此种事业不能不交由犹太及回人代为经营。因为是交给犹太人负责经营的，蒙古人称犹太人为斡脱（Jude），因即称此种高利贷事业为斡脱官钱”，“其贾贩则自鞑主以至伪诸王伪太子伪公主等，皆付回回以银，或贷之民而衍其息。一锭之本展转十年后，其息一千二十四锭”，“大德六年札忽真妃子、念木烈大王位下遣使人燕只哥歹等追征斡脱钱物，不由中书省，亦无元借斡脱钱数目，止云借斡脱钱人不鲁罕丁等三人，展转相攀，牵累一百四十余户”。^②吴文引用《黑鞑事略》谓“其息一千二十四锭”，并不是《简编》误解的“本息一千二十四锭”，后者之所以出错，或受吴文在另外一处说“诸王所取的利是上文所举的羊羔儿息，一锭本钱在十年后要还一千二十四锭”误导。^③《简编》制造了“扎木真妃子”，历史上并无其人，应该是将吴文所引《新元史》“札忽真妃子念木烈大王”诸字抄录中出错所致。^④以上诸例说明《简编》和《大纲》虽存在某些相近的叙事，但彼此未必承袭。

其三，《简编》之所以会写到某些史事，如写鲁仲连，或因《大纲》指引，给编写者以提示，进一步扩展史料，从而形成新的叙事。关于北周宇文邕灭佛，《简编》说：

建德二年（五七三）集百官及沙门、道士，邕登座辨别三教先后，定儒教为先，道教第二，佛教为后。次年禁止佛道二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立通道观，选著名道士一百二十人入观学道，称通道观学士。当他对沙门五百余人宣布废佛的时候，允许沙门提出不该废的理由。五百余人相顾失色，不能作答，有慧远法师抗声陈言，与邕辩难，最后慧远用阿鼻地狱（最坏的地狱）吓邕，邕答，止要百姓得乐，我愿受地狱诸苦。沙门技穷，止得从令还俗。^⑤

《大纲》谓：

武帝本有志于舍末世之弊风，蹈隆周之叡典，遂入卫言。屡集百僚及沙门、道士等讨论三教先后。至建德三年，乃下敕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悉令还俗。《周书》本纪。三宝福财，散给臣下，寺观塔庙，赐给王公。《广弘明集》。及建德六年周灭齐，武帝入邺城，召僧人赴殿，帝谓六经儒教，弘政术，礼义忠孝，于世有宜，故须存立。佛教费财，悖逆不孝，并宜罢之。僧众五百，默然无声，俯首垂泪。有争者，帝谓佛生西域，朕非五胡，心无敬事。既非正教，所以废之。《广弘明集》。^⑥

《简编》直接从《广弘明集》选取更多钱著所没用的史例，如任道林、樊普旷的故事。除了采纳《广弘明集》，范文澜还取材道宣编《续高僧传》中的《慧远传》。《大纲》“默然无声，俯首垂泪”是依据《广弘明集》“众各默然，下敕催答。并相顾无色，俯首垂泪”^⑦，而《简编》“五百余人相顾失色，不能作答”却本之《慧远传》“众各默然，下敕频催答诏，而相看失色，都无答者”^⑧。宇文邕与慧远论辩的结果，《简编》谓“沙门技穷，止得从令还俗”，但《广弘明集》《续高僧传》均说“帝理屈言前，所图意盛，更无所答”。可见原始文献谓宇文邕“理屈”，而没说沙门“技穷”，范文澜此处所言没有严格依据史料。

《简编》叙述宇文邕灭佛的故事，就上下文来看，可以略过。范文澜极可能见《大纲》论及，然后按图索骥，寻找更多的史例，既可增叙事的生动性，还可彰显宇文邕的处事风格：“邕不借政治暴力压迫佛教，让

①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454页。

②③ 吴晗：《元代之社会》，《社会科学》第1卷第3期，1936年4月，第615—618、617页。

④ “蒙古扎木真妃子曾放斡脱钱，恃势索债，竟牵累140余户受罪。”（朱伯康、施正康：《中国经济史》下，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简编》无意间虚构的历史人物“扎木真妃子”，居然出现在经济史著作里。

⑤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181页。

⑥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263页。

⑦ 道宣撰：《广弘明集》卷10《沙门慧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9页。

⑧ 道宣撰，郭绍林点校：《续高僧传》卷8《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运传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82页。

僧徒有辩护的自由，这在统治阶级看来，要算是稀有的事了。”^① 这属于正当参考，不应谓之“剽取”。

《简编》与《大纲》均写到元代恶僧杨琏真伽，前者谓：

桑哥与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合谋，发掘南宋诸帝后坟墓（在浙江绍兴县）……杨琏真伽凡发掘宋帝后大臣坟墓一百一所……私庇逃赋平民二万三千户，佃户五十余万人。^②

后者则说：

杨琏真伽世祖时为江南释教总统，尤骄纵，发掘故宋赵氏诸陵在钱塘、绍兴者及其大臣冢墓，凡一百零一所。私庇平民不输公赋者达三万二千户。成宗大德三年，放江南僧寺佃户五十万为编民，悉杨琏真伽冒入寺籍者也。^③

这则史料见于《元史》《续文献通考》，经常被写进中国通史^④，《简编》此处取于旧史还是转述他书，不易认定，但并非取自《大纲》是能明确的，因为“不输公赋者”的准确数据是“二万三千户”^⑤，而不是“三万二千户”。《大纲》引述出错，可证《简编》此处非本之《大纲》。

关于明朝皇庄，《简编》与《大纲》叙事略有雷同，均依据《续文献通考》卷六《田赋考》和《明史·食货志》，但取材各有不同。《简编》谓“朱厚照登位刚一月，就建皇庄七处，后增至三百余”^⑥，其史源是《明史·食货志》“武宗即位逾月，即建皇庄七，其后增至三百余处”。^⑦ 而《大纲》同引这句史料，却把“逾月”误写成“逾日”^⑧，更证明《简编》不是取于《大纲》的材料。

《简编》与《大纲》同涉的一些史料，虽叙述详略不等，但《简编》先从《大纲》获知史料线索，然后再找相关旧史，这种情形应该是存在的。《简编》里头插叙大量的生动故事，似多事后“逐步扩充起来的”^⑨，并非必不可缺。范文澜最初先写出该书的骨架，再将相关史实安插在各个位置，其中《大纲》应为《简编》提供了不少史实来历，但并不存在钱穆指控范文澜“极多剽取拙著《国史大纲》所引用之材料”的情形。钱穆仅凭两者叙事相近，不加审辨叙事细节的不同，便轻率下结论，也使《大纲》失去了正误的机会。^⑩

范文澜编写通史前期准备不足，写作时间仅仅一年半，延安图书资料相对缺乏，人力薄弱^⑪，不得不参考许多前人著述。事实上，《简编》不仅参考了钱穆《材料》《大纲》，还取材不少同时代其他中外史家的论著^⑫，从材料到观点，甚至移用某些具体的叙事，所以《简编》署名从最初“编著”，1943年即改为“编”^⑬，使其名与实相符，以示对前人成果的尊重，足见范文澜对此书的性质是有严肃的定位，无意掠人之美。更何况，《简编》绝非杂凑成篇，在史实、解释、体系方面，多有“独家”叙事和观点，即使署“著”，亦无可。《简编》系面向大众的通史，之所以没有详列注释和参考书目，“由于顾虑到这本书的读者没有时间翻阅中国旧史料作参考，同时又受到字数及印刷条件的限制，因此，没有把原引材料附进去，也没有在每编每章后列举参考书。这对于想依据这本著作作加深的专门研究的人，当然有很多不方便”。^⑭ 综上，不论从哪个层面讲，《简编》的做法都在学术规范之内，诬之“剽取”有失公允。

①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181页。

②⑥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册，第113、168页。

③⑧ 钱穆：《国史大纲》下册，第456、536页。

④ 钟月秋编：《高中本国史》，长沙：湘芬书局，1932年，第332页；余逊：《高中本国史》上册，北平：世界书局，1934年，第83页；吕思勉编著：《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299页；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4，第389页；章嵚：《中华通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122页。

⑤ 宋濂等撰：《元史》卷202《释老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王圻撰：《续文献通考》卷247《仙释考》，北京：现代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第3743页。

⑦ 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7《食货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⑨ 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6期。

⑩ 钱穆多次修订《大纲》，但有的引文错误一直未改，如“宋孝武帝”“逾日”“三万二千户”，以及下文举证的，将赵翼《札记》“六七十曾孙”误为“六十七曾孙”。

⑪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中国通史简编》（上），再版说明。

⑫ 关于《简编》延安版除了钱穆著作，还参考了哪些中外学者的论著，笔者将另外拟文详考。

⑬ 1943年10月，延安新华书店将《简编》上中两册改版为六册，署名改为“中国历史研究会编”，1948年订正本沿用此署名。

⑭ 金灿然：《〈中国通史简编〉是怎样写成的》，《解放日报》1941年12月14日，第3版。

反观《大纲》又是怎么做呢？以赵翼《札记》为例，此书几乎对近代中国所有通史作品都发生过影响，非仅见于《简编》和《大纲》。通过《材料》能部分揭示《大纲》的知识来源，其中尤以赵翼的著作影响为最，但《大纲》仅写到“辽廷多用汉人，诸帝皆通汉学，辽族亦多好文学”一处，标注“参看《廿二史札记》”^①，其余皆避而不注。钱氏自谓：“余意作一教科书，宜力求简净，惜篇幅，所引材料多略去出处，今乃无可补矣，亦一憾也。”^②事实上，《大纲》“极多”材料和观点直接摘录于赵著^③，如“唐中叶以后之宦官”一节，大部分文字取于《札记》“唐代宦官之祸”“唐女祸”诸条。又如，关于南朝宋武帝子孙相残，兹比对一段文字：

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且无一有后于世者。^④（《札记》）

宋武九子四十余孙六十七曾孙，死于非命者十之七八，无一有后于世。^⑤（《大纲》）

刘裕七子四十余孙六七十曾孙，大部分自相残杀，同归于尽。^⑥（《简编》）

如果按钱穆的逻辑，《简编》此处自然是“剽取”《大纲》，但事实完全不是如此。《大纲》和《简编》均取自《札记》“宋子孙屠戮之惨”条，前者可谓“抄袭”赵著，一方面把“六七十曾孙”误写成“六十七曾孙”，另一方面盲从赵氏“宋武九子”的错误史实，以讹传讹，此后《大纲》各种版本均保留这些失误；后者虽也根据赵著，但订正其误，赵著开首说“宋武帝七子”，后又谓“宋武九子”，前后矛盾，范文澜作了考证，取“七子”准确的史实。

在近代中国“通史”书写中，可以肯定地说，几乎没有不整合前人和时人的成果，根据对他人论著继承和化用的程度，通常存在“著”“编著”“编”三种署名方式。《简编》自降身价，仅以“编”示人，表明借用前人的研究结果，可见范文澜的谦让；钱穆事后虽承认“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亦不备详，义取一律，非敢掠美”^⑦，但署名却选择“著”，不免有抹杀前人成绩之嫌。冠之以“著”者居然指控“编”者“剽取”，不能不说钱氏严于律人，却宽以待己。^⑧

四、中共史家对钱穆态度的转变

延安史家编写《简编》之所以参考钱穆《材料》《大纲》，或与钱著颇多篇幅叙述社会底层（农民生活）困苦、留意民生经济^⑨、揭露统治者黑暗的“进步”倾向有关。1940年前后，不论在延安还是重庆，左翼学界经常正向引征钱穆观点，非但不视他为“反动”史家，反而是令人称道的正面学人。

在延安，陈伯达的长文《墨子的哲学思想》引征钱穆观点，指出“墨子及墨者所代表的，是属于当时下层的被奴役的庶民，这本来不是钱氏的创见，然而钱氏总算是最明白地提出问题的一个了”。^⑩陈伯达的墨子观点又左右了《简编》的墨学论述。^⑪《简编》上册出版后流传到重庆，1942年9月20日《新华日报》第4版发表署名“庞公”的《关于墨家——读书笔记之一》，不点名摘录《简编》第1编第6章第3节“墨子及墨家”大部分文字，加以批驳。1942年11月18日《解放日报》第4版发表叶蠖生《答庞公先生的〈关于墨家〉》。叶氏在答复同道的文章中引用钱穆观点作为“权威”说法，称墨子所属阶级，“钱穆先生以为出自刑徒，用墨翟、黥布相比，虽未必即为定论，要不为无见”。此外，王匡《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认为：“钱穆氏曾说：‘长素之治经，皆先立一见，然后扰乱群书以就我，不啻六经皆我注脚矣，此可谓考证学中之陆

①⑤⑦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361、191页，“书成自记”。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04页。

③ 据单磊《钱穆〈国史大纲〉承袭赵翼著作考述》（《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总第13卷）一文估计，《大纲》承袭或借鉴赵翼著作当不下百处。

④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241页。

⑥ 中国历史研究会编著：《中国通史简编》上册，第166页。

⑧ 1948年6月1日，顾颉刚日记评价：“宾四为人，既骄且吝，又处处好占便宜，不为人留余地。”（《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6，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92页）

⑨ 钱穆曾致信严耕望，对《大纲》论述重点有所说明：“拙著侧重上面政治，更重制度方面；下面社会，更重经济方面；中间注重士人参政，于历代选举考试制度及时代士风，颇亦注意。”（钱穆：《素书楼余沈》，第327页）

⑩ 陈伯达：《墨子的哲学思想》，《解放》第82期，1939年8月30日，第20页。

⑪ 参见李孝迁：《“红色史学”：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新论》，《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王’……这些话都说得极明白。”^① 1941 年 11 月,《简编》上册出版不久,金灿然在延安发表文章,回顾与展望中国史学,将钱穆列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史家代表。对于钱穆提出理想通史应该是“民本的,非帝王的”,中共史家是认可的,承认“他的成绩”,但强调对手没有“忠实”这个目标,反而陷入于精神、心、道等唯心观点说明中国历史。^② 当时延安史家不甚了解在大后方的钱穆动向,他们若知钱穆在《思想与时代》已发表反共言论^③,应不会对他如此“客气”。

大后方左翼学人察觉到钱穆亲国民党、反共产党的言行也略为滞后。钱氏“反动”文章多发表在 1940 年代初《思想与时代》。此刊得到蒋介石的赞助,由张其昀主编,虽出版于贵州,但在左翼学人活跃的重庆、桂林有代售点。1943 年 4 月,胡绳引用钱穆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本年第 18 期《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本文敬悼故友张荫麟先生》一文:“钱宾四教授在他为悼张荫麟先生而作的一篇论文中,列举‘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必具的若干条件,其首次二条曰:‘一者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一个‘新史学家’的确是首先必须真正具有对现实的恳切关怀,和察往迎来的识力与勇气的。否则,或仅埋身古纸堆的知识中,而从事于记注考订之劳,或熟谙故实,空谈今事,唯知以古例今,并无今事之真诚态度,或甚至曲解古史,称扬汉唐,故步自封,而为世事作单纯之辩护,那自然都根本不配做历史研究了。”^④ 钱穆在这篇文章没有提出让左翼学人不能忍受的观点,胡绳仅正面引用,说明他还没发现钱穆的反共文章,最初也没像他后来那样视钱氏为复古主义者。^⑤

1942 年秋,钱穆在成都被蒋介石两次召见,1943 年、1944 年他多次受邀,到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讲学。^⑥ 至少从 1943 年 12 月开始,中共应获知了钱穆那些反共文章,也发现他与国民党的亲密接触^⑦,重庆《新华日报》和左翼学人遂陆续发表批判钱氏的文字,《大纲》则是靶点之一。12 月 10 日,《新华日报》向读者推荐可读的中国通史,所列均系左翼史家的作品,且以《大纲》作为反面通史,批评“著者自命为是上继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事业,但既是意识地为统治者而作,其立场与人民大众根本相反,更是不待言的了”。^⑧ 十天后,陈桑在《新华日报》评论翦伯赞《中国史论集》,又顺带说:“拿较近出版的钱穆教授著的《国史大纲》来看,其中固然也暴露了当时晋室统治者的无能与苟安,描写了当时的南渡的士大夫的生活荒淫与意志消沉,而在另一方面,却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进占北中国的异族统制者的良法德政。至于在这一时代,广大的人民群众对于本族统治者的堕落和异族统治者的入侵有何表示与作为呢?却一点也看不到。”^⑨ 此时离《大纲》出版已有时日,重庆左翼学人对此书应有所了解,但此前并没有拿它“开刀”,可见仅就《大纲》而言,它原本没那么“反动”。受钱穆反共立场的牵连,《大纲》始受到左翼学界的批判。

到了 1944 年,左翼学人对钱穆火力全开。胡绳发表《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引论〉中评历史研究中的复古倾向》^⑩,全面批判钱穆宣扬的“中国

① 王匡:《康有为的大同社会主义》,《解放日报》1942 年 1 月 19 日,第 3 版。

② 金灿然:《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 288—289 页。

③ 如钱穆《中国传统政治与儒家思想》说:“中国社会本无阶级之对立,而近年来又因一党专政转入无产阶级专政之理论,偏要勉强制造阶级意识,国共之争所加于中国社会之损害,已不可计量。最近国难严重之际,尚不放弃共产革命之迷梦。”(《思想与时代》第 3 期,1941 年 10 月 1 日,第 11 页,注六)按:萧公权针对钱氏此文,发表了《中国君主政体的实质》(《中美周报》1947 年第 253、254 期),指出钱氏主张民主政治不是欧美的新发明而是中国文化中固有的成分,中国的君主政体不是专制政体,“这个看法有牵强附会、名实混淆的错误”。

④ 沈友谷(胡绳):《从墨家到道家》,《新华日报》1943 年 4 月 12 日,第 4 版。

⑤ 胡绳《目前思想斗争的方向》(《大众生活》新第 8 号,1941 年 7 月 5 日)一文,批判贺麟的复古主义和战国策派的专制主义,但没有论及钱穆。

⑥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217、221、224 页。

⑦ 当时报纸对钱穆动态有所报道,如 1944 年 2 月 13 日钱穆将在青年团中央团部礼堂演讲“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中央日报》1944 年 2 月 3 日第 4 版作了预告。

⑧ 《在学习中发生的问题》,《新华日报》1943 年 12 月 10 日,第 4 版。

⑨ 陈桑:《中国史论集》,《新华日报》1943 年 12 月 20 日,第 4 版。

⑩ 《大学》第 3 卷第 11、12 合刊,1944 年 12 月。

式之民主”和《大纲》主张中国历史上没有专制政体的观点。^①胡绳先引用钱氏《革命教育与国史教育》一文：

我常听人说，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的政体，是一个君主专制黑暗的政体。这明明是一句历史的叙述，但却绝不是历史的真相。中国自秦以下二千年，只可说是一个君主一统的政府，却绝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政府。^②

然后批评：

像这样的翻案文章，并不是钱先生一个人独倡的。近几年来“学者”“教授”中已有很多人纷纷著论，从各个方面来企图证明中国秦汉以来的政治并非专制政治（如张其昀先生、萨孟武先生）。很显然的，这种看法倒还不只是学术研究上的一种“新”见解，而且是和现实政治中的某种要求相呼应的，但为了现实政治的反动企图歪曲了历史的真象，那却是从根本上丧失了学术的态度和精神了。^③

他认为“钱穆先生把宰相当做政府的领袖，把君主看做只是王室的领袖，这样的分析是根本违背了历史事实的”，并十分深刻揭露“钱先生书中常讥笑旁人袭用欧美民主政治的观念，但我看他提出这种说法也是偷袭来的。大概是因为欧洲近代民主政制中有三权分立，所以也把中国传统政制看做是二权分立，这样就抹煞君主专制政体的真实内容了”。^④

胡绳的批评在左翼学界相当有影响。^⑤同年4月，林念白在《新华日报》一文，将钱氏应召和《大纲》联系起来，极尽挖苦嘲讽：“钱穆先生则兴奋到从书斋里呈出那要人怀了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去诵习的新《资治通鉴》——《国史大纲》和其他长短不一的论文等等。……而又谦称为‘马前一卒’，一边呼吁着‘悯其意，悲其遇’，一边寄期望于‘贤有力者’的‘奖成此’。……照例，儒生们是善于望气的，‘攀龙附凤’，决不落于人后，陈胜一起来，孔鲋便抱了礼器去找他。后来历代的模仿者是真不少。今天哄然而起的一群并不例外，他们很明白自己扮演的是怎样的角色。所以眉宇间一例流露那抑制不住的矜矜然的喜色。”^⑥当时蒋介石积极拉拢大后方知名学者如冯友兰、贺麟、钱穆等，响应者不少，引起左翼学人的不满，林念白所讥讽的正是这些学者。

此外，邓初民批评：“有人（像钱穆之流）在中国历史上看见了有布衣卿相或所谓宰相制度等等，就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政治，都是民主政治，是显然没有一点科学上的根据的。”^⑦宋云彬则指出钱穆《大纲》主张中国两千年来政治并不是专制政治，才是“不明国史真相”，他希望史学家能除去偏见，记取历史的教训，用冷静的头脑与科学的方法从事于国史研究，“明白国史的真相，认识中国的前途，而得到正确的结论。否则曲学阿世，妄肆鼓簧，虽或取媚一时，仍自有其应食之恶果也”。^⑧王亚南认为钱穆否认中国历史存在君主专制政治，其立论的主旨，“不在用以‘变’古，而在求所以‘饰’今，因为他发表那篇大作的抗战后期，‘汉唐盛世’正被一般论坛上宣扬得天花乱坠哩！”^⑨钱穆历史观点背后的政治意图，左翼学人并没有过度解读，自由派学人也反感钱穆之类的学者。1943年10月，胡适一针见血地批评钱穆、张其昀、冯友兰：

① “……昧者不察，遂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引论，第13页）

② 钱穆：《革命教育与国史教育》，重庆《大公报》1941年9月7日，第3版。

③ 胡绳：《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2月，第170页。

④ 胡绳：《评钱穆著〈文化与教育〉》，《群众》第9卷第3、4期合刊，1944年2月，第171页。按：张君劢对钱穆的中西比附也有类似的批评：“其衷心所崇拜者，实为现代西方政治。其称宰相为副皇帝者，以西方责任内阁总理为背景者也。其称士人政府为平民政府者，以现代人民参政为背景者也。……其所以如此，乃钱先生内心上之自卑感有以致之也。”（张君劢：《中国专制君主政制之评议》，台北：弘文馆出版社，1986年，第163页）

⑤ 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几乎把胡绳评论钱穆的话抄过来重述一遍。（华岗：《中国历史的翻案》，上海：作家书屋，1946年，第27、31、32页）

⑥ 林念白：《雨窗漫笔》，《新华日报》1944年5月4、5日，第4版。

⑦ 邓初民：《论民主政治的研究法》，《新华日报》1944年11月22日，第2页。

⑧ 宋云彬：《历史的教训》，昆明《扫荡报》1945年3月18日，第2版。

⑨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时代文化出版社，1948年，第54页。按：钱穆“那篇大作”是指《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重庆《中国青年》第11卷第2期，1944年8月）。

“他们的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拥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① 闻一多也曾公开在报纸上骂钱穆“冥顽不灵”。^② 钱穆的“反动”形象，是当时共产党与部分自由派人士的共识。^③

1944 年 3 月，郭沫若名文《甲申三百年祭》附录《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也对钱穆《大纲》放了一支冷箭：

晚近却有人评论当时的时势说：“其时对流寇常以议抚误兵机，对满洲又因格于廷议不得言和，遂致亡国。若先和满，一意剿贼，尚可救。”（钱穆：《国史大纲》页五七六）其实，明政权在当时既不能解除它自己和民间的矛盾，就已完全没有救的了。^④

正值共产党、国民党、日寇三者如此微妙的时局，郭沫若将钱穆观点从《大纲》中揭出，暴露于众，易引起公愤，更增添了钱穆的“反动”性。郭文原本不必引述钱穆观点，但他特意插叙钱说，一方面为了配合重庆左翼学界批判钱穆，另一方面为了回击《大纲》对他的公开批评。对于郭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提出商代为“正从渔猎初进为农耕”“正在从石器进至金器”“母系中心的氏族社会”“原始共产制的氏族社会”诸说，钱穆严斥之为“无据臆测”“说法之无稽”。^⑤ 先有钱的“因”，后才有郭的“果”，如此方能理解郭氏为什么突兀地牵及钱说。

作为“反动”史家的钱穆，其《大纲》“进步”成分被有意或无意间掩盖了，《简编》与《大纲》原本存在的若隐若现的关联，被时人所忽略，仅凸出彼此的对立。《新华日报》答读者来信介绍史地入门书，推荐了《简编》：“我们已读到全部原稿，内容可算是周审完备，确是从人民大众的立场出发来把全部历史作了一番整理和再估价而撰成的好读物”；同时批评《大纲》：“对于史料虽也作了自己的分析、判断，但其实仍旧和封建统治者的观点立场一脉相承，只是掩盖在新的漂亮的外衣之下罢了。”^⑥ 这种固化的认识影响至今。余英时根据钱穆的说法在文章中多次表示《简编》取材于《大纲》，但研究范、钱的学者对此都不曾回应，或在他们看来，这两部通史绝无交集的可能。

结语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与政治、学派、人事等各种因素缠绕在一起，干扰了人们对史学本相的认识。通过分析《简编》与《大纲》的案例，能给予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首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其对手方（学院派史学、传统史学）看似冰炭不相容，实则共存互补。《简编》的历史观点，如同《材料》《大纲》，不少取自赵翼《札记》，没有因赵翼是传统封建史家，他的历史著作就失去了价值。《大纲》作为学院派史学，也可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所用。《简编》除了参考钱著，还吸收了许多近代中外史家的成果，而这些论著大多是所谓“资产阶级史学”。反之，学院派史学也没有完全拒斥马克思主义史学或唯物史观。从 1920 年代以来，唯物史观在中国史学界甚为风行^⑦，学院派史家如吕思勉、钱穆、陶希圣、冯友兰、陈衡哲、朱谦之、吴晗、张荫麟等，在历史研究中注重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为解释历史的良好工具之一”。^⑧ 到了 1940 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学院派史家表面上

① 《胡适日记》，《胡适全集》第 33 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524 页。

②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235 页。

③ 1946 年 12 月 16 日，顾颉刚给夫人张静秋信中说：“缪凤林来了，他说：‘现在外边骂宾四的真多，如傅孟真等，总是说他像民国初年的康有为，我也曾把宾四介绍到中大，但他们不要。’……不幸，平常的架子摆得太足了，见解也太旧了，弄得到处不欢迎。”（《顾颉刚全集·顾颉刚书信集》卷 5，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7 页）

④ 郭沫若：《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新华日报》1944 年 3 月 20 日，第 4 版。

⑤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 19 页。

⑥ 《关于学习历史的问题》，《新华日报》1944 年 6 月 15 日，第 4 版。

⑦ 顾颉刚说：“近年唯物史观风靡一世，就有许多人痛诋我们不站在这个立场上作研究为不当。他人我不知，我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 4 册，北平：朴社，1933 年，顾序，第 22 页）

⑧ 1924 年 5 月 28 日陈衡哲致胡适信，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84 页。

彼此攻讦^①，但两派实际上没有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在学术上真正绝缘。^②

其次，史家宣称（言）与实践（行）时常脱节。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公开言论中，多不承认资产阶级史学，遑论封建史学，但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如此“纯正”，离开对手方的史学资源，它并不能自立，需要在批判旧史学的基础上才能建设新史学。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不能仅据史家宣称什么，需综合考虑实际如何进行。若仅就马克思主义史学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无异于划地为牢，缺乏对手方的参照，研究者便难以看透研究对象。同样地，钱穆《大纲》对同时代学者的成果和清代史家著作承袭颇多，但他在书中并没有说明，反而在未加细查的情况下，草率指控《简编》“剽取”《大纲》材料。此举对钱氏来说未尝不是一种反噬。《简编》确实参考了钱著，但均属正常的学术利用，绝非通常抄袭可比，无损于范文澜的声誉；而《大纲》并非皆独家论述，实多有所本，且史实错误亦复不少，钱穆却以名著自许，倒暴露了他治学为人的局限。应该说，《简编》与《大纲》均共享了许多传统和现代的史学资源，彼此相异固然是事实，但两者相通的面相往往被人忽略了。

再次，用动态的眼光认识史家。不论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是其对手方的史家，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他们的历史观点经常会发生变化，史家自身也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范文澜作为中共史家的旗手，初到延安，受命编写通史，存在从生手到行家的历练，开始也不能愉快胜任用唯物史观书写中国历史的任务，旧的历史观点一时难以根除。^③《简编》初稿本流产，延安版后来也被范文澜弃用^④，说明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养成非一蹴而就，其深度蜕变需要不断改造。同样的，钱穆后来确实日趋保守，尤其站队国民党之后，但他也不是自始即“反动”，《材料》《大纲》所呈现的叙事和历史观点，若撇开其“唯心”的解释，确有几分“进步”色彩，这是延安史家最初不嫌弃他的阶级身份而加以利用的主因。

最后，用“历史的眼光”衡估史著的“历史的影响”。平心而论，当下《大纲》远比《简编》更受欢迎，拥有大量的忠实读者，而后者虽不能说毫无读者群体，但大体已被视为“过时”的中国通史。但这种情形不是自始即如此，如果回到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大纲》受关注的程度远不如《简编》。^⑤钱穆晚年回忆《大纲》引论发表在报纸引起轰动云云^⑥，实际只是他个人的一种说法，并无充分证据能予以说明。钱著虽被奉为大学丛书之一，但受左翼学界的批判以及钱氏在政治上倾向于国民党的影响，导致彼时学界和社会对其

① 齐思和：《现代中国史学评论》，《大中》1946年第1卷第1期；聂崇岐：《对现在史学界几句诤言》，《现代知识》1947年第1卷第1期。

② 余英时指出：“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史料学派鄙视史观为空中楼阁，而史观学派则又讥史料学为支离破碎，不识大体。”（《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64页）余氏所论大体不错，不过实况恐怕是两派口头上“尖锐的对立”，但在实践层面未必如此，反而互有往来，尤其史观派借力史料派颇多，而史观派则对史料派有所启发。

③ 1949年5月7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举范文澜为例，说他原来研究汉学，学习旧的，但当他“一旦脑子通了，对编写中国历史就有帮助，就可以运用自如”。（周恩来：《学习毛泽东》，《人民日报》1978年10月8日，第1版）事实上，达到“脑子通了”并非易事，需要长期学习。据北方大学学生回忆，时任校长范文澜参加1947年冬“三查”（查阶级、查立场、查思想）整风学习时，“经常吃不下饭”，他要作深刻检查批判，“范老古书读得多，旧学根底深，旧学对他的思想意识有束缚。由于历史环境限制，很长时间里他难以读到马列著作，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还不熟悉唯物史观，到延安后，他的学术思想才有转变。旧学对他的消极影响显然是要作检查的”。（韩辛茹：《重登太行温故情——北方大学琐记》，中国人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校史编写组编：《血与火的洗礼——从陕北公学到华北大学回忆录》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1997年，第245页）

④ 1951年，范文澜斥旧本《简编》为“谬种流传，害人不浅”（范文澜检讨《中国通史简编》未刊手稿），或谓“粗滥的作品”。（范文澜：《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科学通报》1951年第2卷第6期）

⑤ 以时人发表的书评为例，《大纲》寥寥，而《简编》则颇多。

⑥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204—205页。

反响平平。^① 相较之下，被今人不甚看重的《简编》在当时却产生了持续反响，其中固然有因国民党政府多次查禁反而进一步激发了各界的阅读兴趣，但就学术层面来说，其在国人编著的中国通史中也是独树一帜，时人承认其可取之处颇多。^②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战时延安中国史读物研究”（25AZS016）的阶段性成果。撰写过程中得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利栋、上海师范大学陈勇两位老师在史料上的帮助，后期修改又得到匿名审稿人的专业意见，谨致感谢。〕

（责任编辑：周奇）

A Correction on the Claim that Fan Wenlan's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Plagiarized" Qian Mu's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LI Xiaoqian

Abstract: In Yan'an, Fan Wenlan compiled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which incorporated the research outcomes of a multitude of preceding scholars. Among these works, Qian Mu's *Reference Materials for A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and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furnished support for Fan's compilation, spanning from clues to historical sources to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events. Nevertheless, there existed no instance of "plagiarizing" materials from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The similarity in narration between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and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can be attributed to two factors: First, it arose from their shared historical sources; Second, while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did gain insights into the origins of historical facts from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it subsequent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by drawing o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cords, rather than directly inheriting Qian Mu's works. The underlying reason for historians in Yan'an referring to Qian Mu's works likel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se works extensively addressed the hardships of the underclass, issue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and the economy, as well as the darkness of the ruling class—features that embodied a distinct "progressive" character and, to a certain degree, were congruent with the narrative orientation of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In the early 1940s, Qian Mu's political stance gradually came to light. Historian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us shifted their attitude toward him from a positive one to a critical one, with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becoming a target of criticism. This development, in turn, overshadowed the academic affiliation between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and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Key words: Fan Wenlan, *A Short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 Qian Mu, *Outline of National History*, plagiarized

① 以 1949 年齐思和、邓嗣禹各自观察为例，前者《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一文，讲当时较为通行的中国通史，列举了若干种通史书名，包括钱穆《大纲》，未有评语，而用一整段正向评论《简编》。（李孝迁编校：《中国现代史学评论》，第 171、175—176 页）无独有偶，厚《简编》薄《大纲》的做法也出现在邓嗣禹《最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史学》一文。邓文评论了若干中国通史，其中《大纲》仅两句话，强调钱著的观点过于民族主义，历史被他用于激发爱国心，而评论《简编》虽褒贬参半，则用了一段文字。见 S. Y. Teng,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 8, No. 2, 1949, pp. 146—147。

② 参见李孝迁编校的《史学书评：唯物史观中国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 年）所收录的《简编》书评。